

中国军衔制 经历过涅槃式重生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 油画:李明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打天下”的革命战争中,官兵都穿一样的服装而没有军衔,解放后进行的现代化战争和实行军队正规化建设时又深感军队不能没有衔级。1955年以后,全军曾实行军衔制十年,却因受“左”的思潮冲击和制度自身僵化而终止。1988年全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至今仍在继续完善这一制度。 ■据《北京青年报》

1 1955年 首次实行了军衔制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没有外在的“牌牌”,却打败了等级森严的反动军队。不过在国内战场上部队编成简单,战士往往只认识自己的上级,进入多个部队和多军兵种协同作战时,没有军衔便出现了指挥不便。

彭德怀在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后,在朝鲜战场上一次夜间外出时,他看到有两支不熟悉的部队在狭窄的路上争道,双方的干部身上没有军衔标记,结果分不出上下级,互不相让。1952年他从朝鲜回国主持军委工作时,便提出要尽快实行军衔制。

其实早在1950年7月,中央军委就考虑实行军衔制,因随后进行了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军又需要进行精简整编,评衔工作直至1955年才完成。此时为数360万人的军队中有80万名军官和280万士兵被授予军衔,其中有10名元帅、1050名将军和1300名大校。

1955年9月,元帅、大将和其他将官的授衔式在北京和各部队驻地隆重举行,接着各单位又举行了校、尉军官的授衔式,在“十一”国庆阅兵中的受阅部队都佩戴了军衔。在朝鲜的五个军因某些原因于1956年才完成授衔,考虑到“志愿军”名义应与国内解放军有所区别,所佩戴的符号中取消了“八一”字样而只有五星。这些部队于1958年回国后,又按照国内部队的统一标准发放了符号标志。

2 军衔相当于“帽子” 职务如同“椅子”

军衔作为标明军人社会地位和级别的称号,最直观的标志就是缀在肩章或领章上的等级符号。人民解放军两次实行的军衔,主要是以肩章辨别(1958年至1965年军常服上的军衔以领章显示),军人同佩戴警衔的警察一起,成为从外观一看便知等级身份的特殊群体。

一些对军队建设不熟悉的人会问:各国军队都有编制上的等级职务,如军、师、团、营各有级别领导,为什么还要实行将、校、尉、士的军衔制呢?职务和军衔有一定的联系,却不能完全一致。以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解释,那就是军衔相当“帽子”,职务如同“椅子”。

在军队中,指挥位置即“椅子”是有限的,而且应给予有带兵能力的人。代表荣誉和待遇的“帽子”倒是可以适当多设一些,尤其是对那些历史功劳大的人。

中国古代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衔,却也实行过官职和爵位并立的制度。唐代贤相李泌就提出“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的著名原则。

1955年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就突出了级别酬劳、职务选能的原因,待遇主要由军衔决定,职务则选胜任者。在首次授军衔时,同一军衔授予范围的跨度很大,如少将的授予者可以包括正师、副军、正军至副兵团四个职务段,中将的授予跨度也可包括正军至大军区副职这三个职务段。当时授衔的掌握相当严格,如只有极少数资格很老、战功卓著的正师职军官被授予少将,大部分资历较浅的副军职军官只能授大校。

3 “开国将帅”1000余名 即诞生在首行军衔制之时

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对全军指战员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对他们革命战争中个人业绩的一种表彰和肯定。尤其是肩章佩戴在外面,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如何评好军衔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最高统帅,军队评衔时领导干部们一致认为应授予他大元帅,服装厂还做好了军装。毛泽东却拒绝接受这一军衔,曾讲过穿上那身衣服多不舒服,怎么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他对实行军衔制在思想上是有所保留的,不过还是尊重了多数人的意见。

原定评为元帅的13人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已经不担任军职,都推辞不受。元帅最后评定了10人,就是著名的十大元帅,按名次排列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

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10人中,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为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

委员级,王树声、许光达定为正兵团级。

1955年授上将军衔有57人,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干部,也有个别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干部。

1955年授中将军衔177人,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干部和一部分战功显赫的正军级干部。

1955年授少将802人,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干部,还有资历较深且战功卓著的正师级干部。

此时的解放军将领虽是身经百战,大都经过20年以上的沙场锻炼,拜将之时却还是风华正茂。如10名元帅平均年龄57岁;10名大将平均年龄51.7岁;上将平均年龄47.7岁;中将平均年龄45岁左右;少将平均年龄43岁,最年轻的两名少将为34岁。

1955年授衔后又加上1961年、1964年两次补授的少将,被称为“开国将帅”的共有1614名,从籍贯看大都出身最早建立红军的县份。

4 军衔制曾被取消 23年后重新授衔

随着1963年以后全党全国展开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军衔的非议也随之增长。1965年5月,中央对外正式宣布取消军衔,从同年6月1日起全军统一佩戴五星红帽徽和红领章,只是以军装上四个兜、两个兜来区别干部、战士。

当时宣布取消军衔制,是认为它“与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的”。除此之外,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度相对僵化而无活力,造成了干部晋升“一潭死水”的状态。当时军队内部没有确定干部正常的晋升、转业和退休制度,高层职位近乎“终身制”基本不动,下级自然很难晋升。例如在开国少将中没有一人能提升中将,第一批大校中只有四分之一能提升少将,上校以下干部也因晋级渠道升迁缓慢,只有部分尉级军官和士兵才能随职务变化晋升军衔。

解放军取消军衔后,又出现了干部晋升和待遇的无序混乱。那时部队干部仍

然实行级别与职务的“两轨制”,其级别不是军衔而是套用地方干部的行政级别,从军委领导的3级直至排级干部的23级。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左”的思想,在重新强调现代化、正规化的大背景下,1979年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军衔制。不过,十年动乱结束后军内长期积累的职级混乱一时不好解决。上世纪80年代初军委组织班子初拟军衔制时,曾设想过这一制度与上次军衔制作用相似,即主要解决待遇问题,随后地方干部工资级别改革冲击了这一设想。

1988年,解放军和武警再次实行军衔制,并伴之以正常的晋升和干部补充、退休制度。近30年来,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兵”相适应,每年都有大批军官退役,又有数量相近的军官晋升,这样才使现有军衔制得以畅行,增强了军人的荣誉感,对多兵种协同指挥和对外交流也非常有益。

康美来 养生大讲堂

康美来集团:在产业扶贫大道上砥砺前行 系列报道之二:一份沉甸甸的大别山区产业扶贫答卷

金寨县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同时也是著名的“贫困县”。康美来集团通过产学研合作,以科学思维和先进技术,采用现代农业合作模式,用十二年时间,彻底改变了大别山灵芝产业格局,创建了属于金寨大别山的灵芝品牌,带动近万贫困户种植灵芝,实现收入5亿元,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属于康美来集团的产业扶贫“答卷”,董事长余春富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现在,灵芝种植户的的笑声越来越响亮,荷包也越来越饱满。“现在一年固定四、五万块钱收入,家里也盖了楼房,合作社可以给你保证,除去工资每年还有分红。”沙河乡农户李书举高兴地说。以前李书举自己摸索着种植两亩地灵芝,为提高产量打药、施肥,灵芝品质低,卖不出好价格,正当他对种植灵芝失望之际,合作社为他打开了大门。2010年,李书举加入力源合作社,从此再也不用操心种植管理和销售问题。

像李书举这样的农户沙河乡还有很多,桃岭乡龙潭村陈家良,过去种过灵芝,有技术,无销路。2015年,当康美来董事长余春富知道他有灵芝种植经验并且还是当地在册贫困户时,主动找到他,为他制订脱贫计划发展灵芝种植,公司经过研究决定让他先试种5亩,很成功,赚了2万元;2016年他就加大规模,扩大到45亩,一年净收入高达25万元。

七月流火,酷暑难耐。然而在绵延数公里的长岭水稻示范基地里却人喧鸭鸣,热闹非凡。一块醒目的招牌矗立在大田中:康美来集团云源谷股份公司高山有机稻种植示范基地。云源谷股份公司基地负责人徐本军表示,2017年,康美来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在金寨县最边远的长岭乡、双河镇等贫困山区开辟高山有机水稻种植基地1500亩、大别山土鸡散养基地300亩和大别山黑毛猪养殖基地,其中长岭乡高山有机水稻种植基地,用高于

市场的租地价格优先扭转47户贫困户水田,并优先照顾这些贫困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长年在水稻基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此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目前,示范基地与胜利、界岭、洪畈三个行政村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以每亩6、7百元不等的价格租赁村民水田,签订5年流转土地经营权证。公司依照国家有机种植标准,在示范基地推行“稻鸭共育”耕作模式。

长岭乡党委书记陈奎松对产业扶贫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说,2017年金寨县制定了“两业”扶贫政策,即就业扶贫和产业扶贫。就业主要是外出打工,这种创业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乡里侧重点放在产业扶贫上。除了对个体散户创业实行补贴外,重点是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扶贫。这个主体就是种养大户、各类合作社和外来龙头企业。